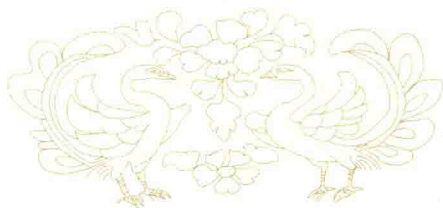


西部美术考古丛书

佛教艺术模式与样式

罗宏才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重点图书

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资助出版

西部美术考古丛书

佛教艺术模式与样式

罗宏才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艺术模式与样式 / 罗宏才主编. — 上海 :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7.3

(西部美术考古丛书)

ISBN 978-7-5671-2647-3

I. ① 佛… II. ① 罗… III. ① 佛教-宗教艺术-美术考古-中国 IV. ① K8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5087 号

责任编辑 傅玉芳
助理编辑 刘 强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 鑫 章 斐

佛教艺术模式与样式

罗宏才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021-66135112)

出版人 戴骏豪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960mm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64 千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1-2647-3/K · 157 定价: 58.00 元

序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罗宏才教授主编的“西部美术考古丛书”即将问世，要我写一篇总序，尽管我近日非常忙碌，身体还有些不适，还是答应下来，这固然是因为罗宏才教授出身西北大学，与我颇有渊源，但更主要的是我深觉这部丛书的立意甚好，符合当前学术发展的趋向。至于我能否体会丛书的宗旨，也就在所不计了。

我想分三个层次来说，首先是西部考古，然后是美术考古，最后再试谈西部美术考古作为学术前沿的地位。

现代意义的考古学开始传到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不少外国学者及所谓探险家曾进入中国西部。在此刺激之下，中国有关学术界也对西部地区的历史文化给予特殊的关切。然而在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工作开展之后，更多的注意是集中在作为古代王朝核心的中原一带，对广大西部的探究相对说来要少些，有大量没有解决的课题存留至今。

实际上，西部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的重要性是用不着说的，周秦汉唐的发展过程，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以长达八百年的周朝而论，其早年的兴起，正是背靠西北，继之而来的秦人也走着类似的道路。不深入考索西部的文化，便谈不上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的全貌，而由于传世文献内容的限制，这方面研究不得不更多地依靠于考古学。

美术考古则是当前中国考古学急待进一步促进发展的部分。从学科的去历史来看，中国的考古学和西方的考古学本来有着先天的一些差异。如很多考古学史的专家所指出的，发轫于19世纪早期的西方考古学，原系自欧洲传统的古物学演变而成，而后者从来是和美术的鉴赏和论析相结合的。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基础的，则是源远流长的金石学，其成形为一门学问，至少可追溯到北宋，而金石学的特点是以“证经补史”为职志，最重视有



文字的遗物,以至同专研文字的所谓小学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的考古学始终与研究文献的历史学彼此配合,恰如夏鼐先生所形容,似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成为认识古代的必要途径,是我们今后仍然要继续的。

然而,我们想有更大的进步,还应该学习西方考古学较我们优长之处,其中很有价值的一点,就是要重视与美术史的结合。比如我们自己是研究古代青铜器的,常说考察青铜器当有五个方面,即:形制、纹饰、文字、功能和工艺,现在想来一定要加上一点:青铜器的美术性质,这样我们的研究便更臻于全面。这个例子不一定妥当,但似足以例其他。

近年,已有一些学者在推广美术考古方向做了有益的工作,这使我回忆起山东大学已故的刘敦愿先生。刘先生一生为振兴中国的美术考古反复呼吁,功绩卓著。收录1998年出版的《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的他的《传略》说:美术考古是一个跨学科性质的科研领域,要搞美术考古的研究,必须既具备考古专业知识与技能,又具备美术专业知识与技能。刘敦愿先生对此寄以厚望,他如果得知今天这方面的进展,是一定会感到欣慰的罢。

中国西部的历史条件与中原等地区不同,不仅保存着地下地上大量的美术品,而且是与境外文化交流沟通的必经通道,从而美术考古,特别是强调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的美术考古,在此有着十分广阔的用武之地。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古代文化有其自己的起源和独立的发展,然而其进程从来不是完全封闭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境外文化的接触,主要的路径是通过西部,包括西北和西南。所谓“丝绸之路”的原始,很可能应大为上溯,其间蕴藏着许多奥秘,有待大家来开发。

“丝绸之路”的研究,现在已经从根本观点上拓展了,这个观点是把欧亚大陆看做一个整体。以这样的观点作为基础,形成了20世纪后期逐渐推广的欧亚学。欧亚学的刊物和著述,在外国已有不少,国内如《欧亚学刊》也已经出版了好几年。假如我们把中国的西部考古,尤其是西部美术考古,同欧亚学的探究适当地配合起来,我认为肯定会产生非常重要的新成果。

翻阅“西部美术考古丛书”第一种《从中亚到长安》所收论文,已可看到各位学者都在努力拓广自己的眼界,采用最新的方法,再看丛书今后各种拟议中的目录,更足见主编罗宏才教授的志向。谨趁此机会,祝愿这部富于学术价值的丛书取得预期的成功。

李学勤

2011年9月19日

于北京清华园

目 录

第一章 源流与轨迹

- 第一节 巴蜀东汉至蜀汉铜摇钱树佛像模式和源流探讨 胡文成、胡文和/3
- 一、海内外现存的铜摇钱树佛像 5
- 二、巴蜀早期佛教遗迹的年代 29
- 三、印度早期钱币上佛像造型模式的启示 40
- 四、摇钱树顶部佛像被尊称为“天中天”的源流和宗教意义 48
- 五、结语 60
- 第二节 北朝佛教石窟艺术样式西传及流变的区域性特征
——以麦积山第127窟与莫高窟第249、285等窟的
比较研究为中心 沙武田/65
- 一、讨论对象的历史性选择 67
- 二、比较研究的前提 70
- 三、比较研究 76
- 四、比较的结论 89
- 五、结语 92
- 第三节 宁夏固原九龙山隋墓出土金冠饰宗教意义及墓主人
身份考察 陈 伟/94
- 一、金冠饰的图像解析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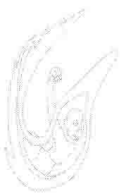
二、金冠饰图案的来源及宗教意义	96
三、从金冠饰的宗教特征考察墓主人的身份	105
四、结语	111

第二章 模式与样式

第一节 北魏佛道造像系统万年样式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	罗宏才 /115
一、相关信息的清理与甄别	123
二、材料、师匠与传统	138
三、图像、题铭与风格：以冯神育等二百廿人造像碑为中心	151
四、整体风格与阶段风格	179
五、结语	191
第二节 菩萨造像佩饰系统的“景明模式”	刘明虎 /197
一、古阳洞菩萨造像佩饰系统样式的发展与转变	198
二、宾阳中洞菩萨造像佩饰系统等级规制	204
三、“景明模式”的概念与样式特征	209
四、结语	213
第三节 甘露寺铁塔佛教造像风格样式	朱婧媛 /215
一、甘露寺铁塔的纹饰与含义	216
二、甘露寺铁塔的建筑内涵与特色	223
三、甘露寺铁塔与玉泉寺铁塔的异同比较	224
四、结语	228

第三章 调查与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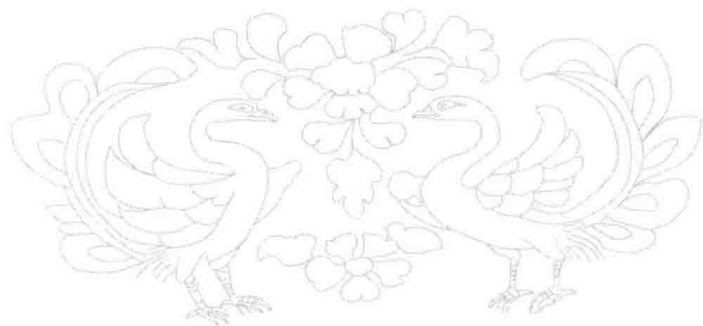
第一节 窟龕图像样式与内容时空变化现象的考察	
——以麦积山第70、71窟为例	孙晓峰 /233
一、窟龕位置和基本情况	233
二、窟龕形制的讨论与分析	238



三、重修痕迹考察与分析	242
四、开凿时代与重修时间	248
五、窟龕性质及其蕴含的佛教思想	255
六、结语	262
第二节 敦煌图赞形式绘画	王惠民/263
一、邈真赞	263
二、敦煌石窟的图赞形式绘画	268
三、结语	287
附：敦煌写本《十大弟子赞》(A本)	288
 第四章 资料与信息	
第一节 四川佛教造像样式系统	雷玉华/293
一、5世纪的造像样式	295
二、6世纪前半叶的造像样式	296
三、6世纪后半叶的造像样式	300
四、7世纪中期至8世纪前期的造像样式	308
五、8世纪中期至9世纪前半叶的造像样式	313
六、9世纪中后期至10世纪中期的造像样式	316
七、10世纪末至13世纪的造像样式	317
八、13世纪以后的造像样式	318
九、结语	320
第二节 从张石安释迦佛造像座乐舞图像组配规律看佛教艺术样式 信息整理途径	茹溪/321
一、北周粟特人墓葬乐舞图像及其组配规律	323
二、北周张石安释迦佛造像座左右两面乐伎演奏乐器辨识	334
三、张石安释迦佛造像座乐舞组配	337
四、结语	340
后记	343

第一章

源流与轨迹



第一节 巴蜀东汉至蜀汉铜摇钱树 佛像模式和源流探讨

巴蜀早期佛教遗迹均发现于墓葬中，在学科分类上属考古学“吴晋南北朝墓葬”^[1]，例如，蜀地崖墓中的画像石佛像、陶树座佛像。但从巴蜀崖墓中出土的特有的铜摇钱树，按考古学分类，应属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巴蜀文化”。而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巴蜀文化”内涵的介绍，都缺乏对铜摇钱树的分类说明^[2]。铜摇钱树研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原因是近年来随着四川和三峡考古工作的开展，汉代铜摇钱树不断有新的发现，特别是铜摇钱树枝叶、树干、树冠佛像的造型模式，不仅涉及宗教考古、美术考古，更涉及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重大关系，所以越来越为学术界所关注。

海内外现存于世的摇钱树佛像有：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5尊，重庆忠县涂井5号崖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6尊，忠县涂井崖墓出土编号为M14：31①的摇钱树树干上3尊、编号为M14：31②的摇钱树树干上5尊，绵阳双碑白虎嘴M19号崖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4尊、M49号崖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3尊，四川梓潼县宏仁羊头山东汉砖室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1尊（存疑），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的东汉摇钱树树干上5尊、树顶上1尊，重庆国友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四川三台县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6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应是绵阳地区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2尊；巴蜀以外，属于西南地区的，贵州清镇11号砖石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2尊；陕西城固县砖室墓出土的摇钱树树顶饰上1尊、汉中铺镇5号砖

[1]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页，第550页“吴晋南北朝墓葬”条“四川崖墓”。

[2] 同上，第29—30页“巴蜀文化”条，有关铜器的分类说明中，未提到“铜摇钱树”。



室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2尊；流失海外，据考证应是从四川流失出去的，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收藏的一件摇钱树树干上1尊、日本私人收藏的两件摇钱树树干上3尊、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收藏的一件应是从四川绵阳地区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1尊；罗二虎指出重庆开县红华崖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4尊^[1]。迄今为止，资料已经公开的摇钱树树干佛像，只有在2001年底于重庆丰都县镇江镇槽房沟发掘的9号东汉延光四年（125）砖室墓中出土的一件摇钱树树干上1尊，可以确定为中国最早有纪年的佛像。这些摇钱树树干佛像，国内收藏的以及流失海外的，其出土地点可以明确的有：四川省的绵阳、安县、三台、梓潼，重庆市的忠县、丰都、开县，贵州省的清镇，陕西省的固城、汉中。据何志国统计，分布在20株摇钱树上，共计67尊佛像；位于摇钱树枝叶上的有2尊，即四川安县和陕西城固的摇钱树^[2]。其实，巴蜀东汉的崖墓砖室墓数量甚多，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一般墓室中都有摇钱树（不一定每株摇钱树上都有佛像）（图1-1-1、图1-1-2），由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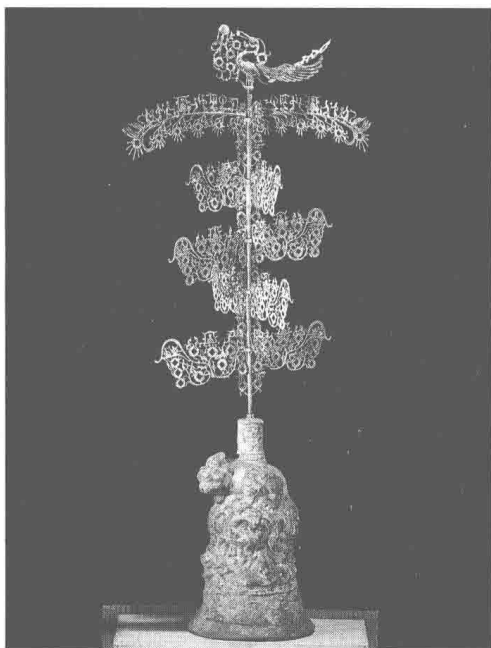


图 1-1-1 四川绵阳出土东汉铜摇钱树（绵阳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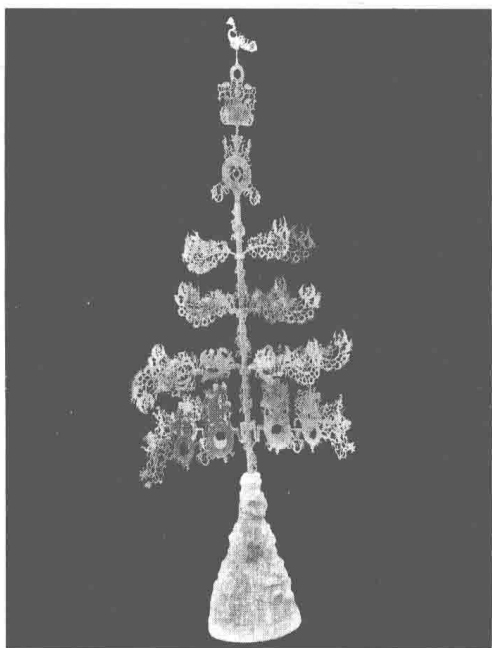


图 1-1-2 四川彭山出土东汉铜摇钱树（原彭山县文管所藏）

[1] 罗二虎：《论中国西南地区早期佛像》，载《考古》2005年第6期。

[2] 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201页，摇钱树树干佛像情况表（表中未列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收藏的一株摇钱树佛像）。

盗掘和破坏,损毁和流失的摇钱树佛像数量远远不止上面的统计数字。

其他与摇钱树佛像有密切关系的是,四川西昌高草乡摇钱树枝叶上的西王母像、茂汶摇钱树圆壁上的西王母像、绵阳何家山2号墓摇钱树枝叶上的西王母像及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摇钱树上的西王母像,其额中部都有类似佛像的“白毫”(ūrṇā)相^[1]。

本节分为四个部分:①海内外现存的铜摇钱树佛像;②巴蜀早期佛教遗迹的年代,着重论证巴蜀摇钱树佛像的年代,摇钱树佛像的类型、分期;③印度早期钱币上佛像造型模式的启示,着重考释迦腻色伽一世金币的正、背面图像;④摇钱树顶部佛像被尊称为“天中天”的源流和宗教意义,着重论证东汉时期中土汉译佛典中的“天中天”来自犍陀罗,犍陀罗地区佛教徒的死后理想观念以及相关的图像东传巴蜀为本地世俗接受,遂使得摇钱树佛像逐次升到树顶部,而巴蜀最早的方志《华阳国志》却未记载这一历史现象和事实。

一、海内外现存的铜摇钱树佛像

(一) 中国内地现存的铜摇钱树佛像

1. 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铜摇钱树佛像

1956—1958年,贵州省博物馆在贵州省中西部乌江支流羊昌河沿岸的清镇、平坝两县境内清理发掘了28座汉代墓葬,并于1959年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了这批资料^[2]。发掘报告中,曾报道了在清镇11号墓中出土有铜人像1件,并附有黑白线描图,但当时没有确定该铜人像是一尊佛像。1994年11—12月在贵州省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协助下,罗二虎对该铜人像及同时出土的摇钱树残件进行考察、测绘,终于确定该铜人像就是一尊早期佛像^[3]。

贵州省博物馆现保存的残摇钱树树干有三段,上面有两尊早期佛像。

佛像一,在一段残树干上。树干长约7厘米、宽约1.4厘米、厚约0.9厘

[1] 金申编著:《海外及港台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页图版,“摇钱树,东汉(3世纪初),青铜,高约100厘米,摇钱树上端有佛坐像,是早期佛教美术实物,甚为珍贵”。笔者分析全图和局部图,西王母像应是在钱树顶端。

[2]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3] 罗二虎:《略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早期佛像》,载《四川文物》2001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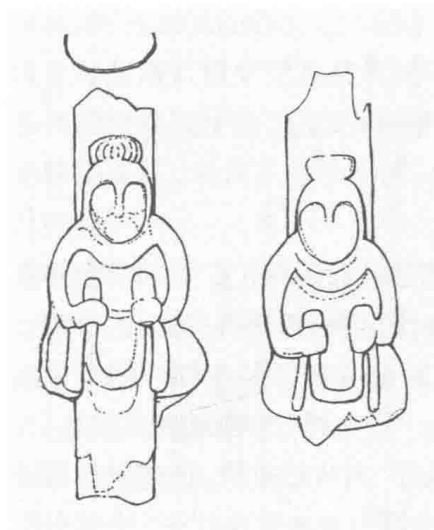


图 1-1-3 贵州清镇汉墓钱树残件上两尊佛像

米。树干的剖面呈椭圆形，佛像与树干融为一体，由双范合铸而成。佛像锈蚀较严重，高约4.7厘米、宽2.8厘米，头顶有高肉髻，其下面发式呈纵向。着通肩衣，双手置于身体前面，似乎都是握住衣角下裾，双手之间衣服下摆呈U字形，因面部锈蚀不清，上唇是否有髭须无法辨认^[1]。

佛像二，高约4.6厘米、宽约2.6厘米，造型与佛像一大体相同，但锈蚀更严重(图1-1-3)。

清镇11号墓的这两座墓葬的年代为东汉晚期至末期，其下限可能会晚到蜀汉前期(221—242)，而这株摇钱树及佛像的制作年代与这两座墓葬的年代基本同时。其文化性质，由于清镇11号墓为汉人所使用的墓葬，而摇钱树也是当时汉人所使用的随葬冥器，因此，应该属于东汉至三国时期与四川盆地、汉中盆地、云贵高原等地区一起形成的一个以四川盆地为核心的区域性文化圈。

关于清镇摇钱树佛像的传入路线，罗二虎认为，佛像传入贵州地区的途径可能有两条：一条是从印度经缅甸、云南而传入贵州；一条是从印度先传到四川，再从四川传入贵州。目前在缅甸和云南境内尚未发现中国东汉时代晚期或更早的与佛教直接相关的文物，因此很难断定佛像是经此道传入贵州地区的。四川地区发现的早期佛像，均出土在墓葬中，并且多是在摇钱树的树干上。贵州清镇11号汉墓中发现的摇钱树佛像，其所在位置、佛像造型特征以及铸造工艺等，都与前者基本相同。所以，其与四川地区早期摇钱树佛像有密切关系，虽然两者在造型上存在些微差异，但应该是贵州的早期佛像模仿四川地区的早期佛像。因此，完全可以有充分理由认定，清镇摇钱树佛像是从四川传入的。

2. 陕西城固县汉墓出土的铜摇钱树佛像

1957年，陕西城固县第一中学发掘的砖室墓中出土了一株有佛像的

[1] 罗二虎：《略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早期佛像》，载《四川文物》2001年第2期。

摇钱树，后由该县文管所收藏。1987—1990年，王寿芝以“桃都”为名，分别在《文博(陕西)》和《中国文物报》上报道了这株摇钱树，只是其将摇钱树上的佛像误认为“女神”。其时该摇钱树保存较完整，通高104厘米(图1-1-4)^[1]。1994年，罗二虎至城固考察，方发现摇钱树的枝叶上有佛像。

据罗二虎详述^[2]，城固县文管所同志介绍，摇钱树出土于县境内一座东汉砖室墓中，墓葬情况现已不详。这株摇钱树由树座和树体两大部分组成，树座为釉陶制作，树体为青铜制作，由于树座和树体顶饰都有不同残损，现残高93.5厘米。树体本身由树干、树枝和顶饰三部分构成。青铜树体制作是由双范合铸分段铸造的，然后再相接、插合而成。青铜树体又是插在陶树座上的。

顶饰为薄的叶片形，叶片正反两面的图像完全相同，图像的具体刻画则由凸起的线条构成。顶饰部分通高约22.8厘米、厚0.2—0.4厘米，因略残而宽度不详。顶饰的底部有插头，用以插合在树干上(图1-1-5)。佛像位于顶饰的中间，包括项光在内通高6.5厘米、宽4.1厘米。佛像头顶上有肉髻，肉髻上的头发依次向上叠成半同心圆的形状，即贵霜秣菟罗佛像的Kaparda(蜗牛壳)式肉髻(Ushnisha —— a high top knot)，其下半部的头发用平行的纵线表现，额际上有白毫相，上唇有两撇略向上翘的髭须，项光为两个同心圆构成，两个同心圆之间有6个小圆圈。佛像身着通肩衣，外翻的领缘镶饰变形的莲瓣纹，其左手施无畏印，右手握住衣角下裾(没有绕呈U字形再延经左腕下垂)^[3]，在两手之间的下部有一个近似袂(罗二虎的辨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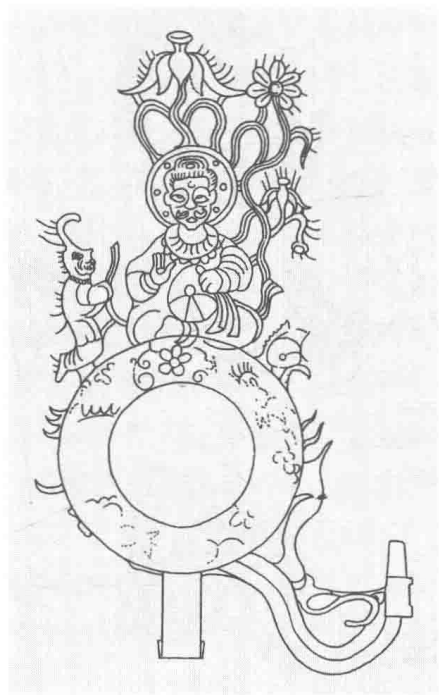


图1-1-4 陕西城固汉墓钱树(背面)
顶部佛像线描图

[1] 王寿芝：《城固出土的汉代桃都》，载《文博(陕西)》1987年第6期；王寿芝：《桃都·天鸡·摇钱树》，载《中国文物报》1990年9月13日第4版。

[2] 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载《文物》1998年第12期。

[3] 原文中说佛像是以“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端”，同上。原文中的图三(摇钱树顶部线描图)，其位置与图二(摇钱树顶部照片图)正好相反，图三线描图为摇钱树的正面，图二照片图为摇钱树的背面。因此，图三线描图中的佛像便成为以“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端”的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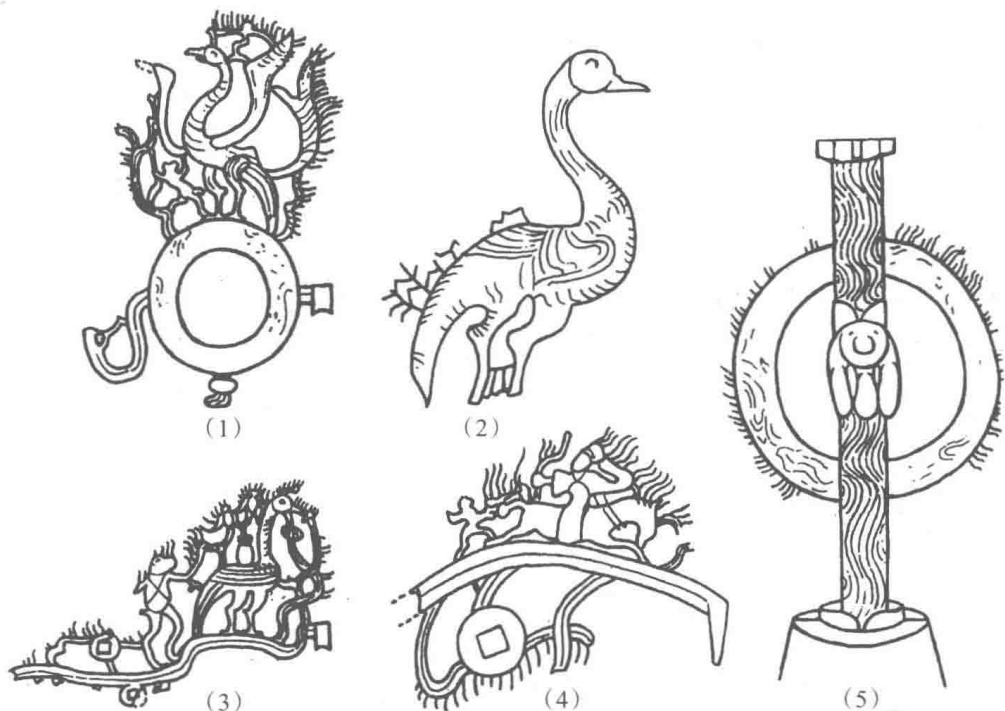


图 1-1-5 陕西城固汉墓钱树细部：(1) 钱树顶部两倾饰件；(2) 钱树残枝 2；(3) 钱树残枝 3；(4) 钱树残枝 4；(5) 钱树树干下部

有误)的物体,作趺坐姿,坐于大圆璧的顶端。璧的直径为7.4厘米,其表面装饰有呈压扁状的莲花图案。佛像的左侧有一人呈胡跪姿向佛揖拜,其头戴“异形高冠”^[1],鼻下有胡髭,着袍,领口部分也有一个用平行纵线构成的装饰,坐佛和揖拜人物都位于一个特大的璧上。这个形象的身份,罗二虎认为:在成都附近出土的西王母仙境画像砖上可见到与该摇钱树上揖拜人物相似的形象。画像砖上的形象更清晰,手中持笏,背上插幡,显然是一个道士(在西汉时期称为“方士”),他的作用在于沟通人神,助人升仙^[2]。因此城固摇钱树上的这个形象也应属道士类的人物^[3]。

关于城固这株摇钱树所属的文化圈和年代。罗二虎认为:城固县所在

[1] 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载《文物》1998年第12期。

[2] 同上。

[3] 罗先生的解释有两点经不起推敲:其一,该形象头戴的不是异形高冠,而是呈尖顶胡帽(锥形帽);其二,形象上唇有髭须,中土和蜀地没有这类人种,其身份应为胡人。本来在其对面的壁上似乎还有一个形象,作为佛像的二协侍,可能出土时就已缺失。彭山崖墓出土的陶座上佛像的二协侍就不是中土人种形象,则是最好的证明。这种尖顶胡帽在1世纪贵霜王朝的赫拉乌斯王(King Herais)统治大夏(Bactria)时流行,参见 *Origins of the Gandharan Style*, p.29, PL. 49. Head of a prince, from Dalverzin, Hamza Institute of Fine Arts, Tashkent.

的汉中地区，现行政区划隶属陕西省，但其地处秦岭以南，自古以来就与四川地区关系密切。战国时期，这一地区属巴蜀文化的分布范围；汉代，这里为汉中郡，属于益州刺史部；三国时，又属于蜀汉政权统辖。从这株摇钱树的造型特征、图像内容和制作工艺等方面观察，其与四川绵阳一带地区、重庆忠县等地区墓葬中出土的摇钱树基本相同。而且东汉至三国时期汉中地区出土墓葬总的情况都与那时益州刺史部所辖其他地方的很相似，可以纳入西南地区同一地域汉文化的范畴。因此就这株摇钱树以及汉中地区当时文化所属的性质而言，应与四川以及西南地区的关系更密切，而与陕西秦岭以北地区的文化差异很大，后者的汉魏墓葬中未曾发现过摇钱树。而摇钱树顶部饰有佛像的目前仅发现这一例，与此图像构成较为接近的有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墓^[1]、四川西昌高草出土的以西王母为中心的摇钱树顶饰^[2]，这两座墓葬的年代均为东汉晚期。综观这株摇钱树的整个造型，其更加接近于东汉晚期摇钱树的造型特征。从已公布的有关摇钱树资料比较，其年代不会晚至蜀汉时期(221—263)^[3]。

3. 四川梓潼县文管所收藏的铜摇钱树佛像

1970年，梓潼县宏仁乡羊头山出土摇钱树，乡民挖出后送交县文化馆，现藏梓潼县文管所。2003年8月何志国至该所考察，在摇钱树上发现了新的佛像种类。除了铜摇钱树外，随墓出土的另有铜马尾巴和铜俑残片，未发现摇钱树座^[4]。

树干断面为椭圆形，长径2.6厘米，短径1.9厘米，树干壁厚0.2厘米；树干共计有6节，每节高21厘米。树干中央有一人像，高9.8厘米，宽4厘米，呈圆雕形式，裸体，头、鼻较大，大眼圆睛，双耳甚大；右手握左手贴于胸前，肚腹鼓而略下垂，呈跏趺坐姿。人像背景为枝叶形成背屏；其右侧有一人像侧身面向中央主像，单腿跪于一八瓣盛开的莲花上，并以双手扶住中像臀部；中像左侧一马立于也有八瓣的莲花上，双耳竖立，面向主像(图1-1-6)。

[1] 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载《文物》1998年第12期；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91年第3期。图三〇“铜摇钱树叶拓片”1.壁(1/3)。

[2] 刘世旭：《四川西昌高草出土汉代“摇钱树”残片》，载《考古》1987年第3期。

[3] 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载《文物》1998年第12期。

[4] 何志国：《四川梓潼汉末摇钱树小记——兼考梓潼摇钱树佛像》，载《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

